

幸福时光

贺思敏 博 1991 级 计算机系 萨克斯

明年 2021 年是军乐队建队 105 周年。我是 1986 年考入计算机系，一直读到 1997 年博士毕业，其间 1991 到 1995 我在军乐队吹中音萨克斯。离开军乐队已经 1/4 世纪了，我一直想写点什么，向军乐队表示谢意。再不写，可能既想不起事，又抬不起笔了。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军乐队百年纪念文集，思绪一年一年倒回到从前。

我从小喜欢音乐，却一直没条件深度体验。父亲一生都埋怨母亲，说年轻时想买一架二手手风琴都没获支持，可想而知我更是啥都乐器没有。我家门口就是我后来就读的中学，所以小时候我常去校园里溜达，在操场上看红旗招展、鼓乐喧天地反击右倾翻案风，在窗外看教室里一班学生在拉小提琴，在街道上看军乐队从家门前昂首走过，这一切距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就再也看不到这些文艺景象了，学校开始狠抓升学率，记得小学三年级我视力还是 1.5，小学五年级视力就剩 0.1 了，中学六年也没有什么业余社团活动，时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学校里能正常上音乐课就不错了，课间偶尔会放一点音乐，印象比较深的是《溜冰圆舞曲》。后来有了录音机，在家里能听到世界名曲，印象比较深的是小夜曲、圆舞曲，还有那首《钟表店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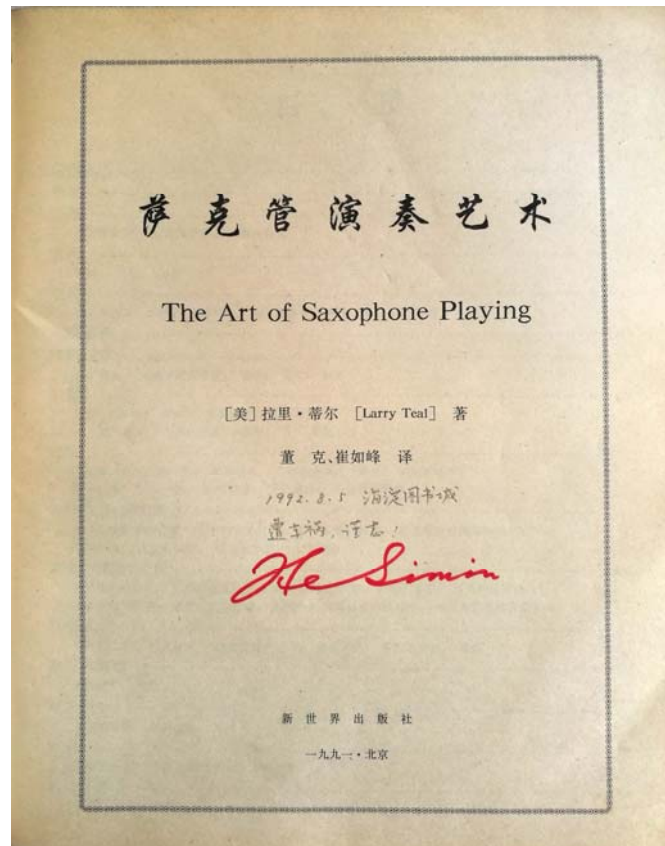
进入清华读大学后，时代惯性使然，我参加班级、党团的“主流”活动多，而对文艺社团的“非主流”活动则完全没有概念，也没有老师、学长主动召唤我。我刚刚查阅了历届军乐队员名单，发现计算机系 1986 之前每一级至多只有一个军乐队员。观察周边同学，感觉多数可能过得比我还单调。

我得庆幸，因为读博士，我有缘再次迈进清华园，从而开始了新生活——我加入了军乐队。具体的契机我已记不清楚，但肯定是自己蓄谋已久、主动上门的。先参加了军乐队的室外招新面试，记得是我们系比我低两级的军乐队著名号手陆松涛、英俊的军乐队队长陈鹰给了我很大支持，把我送到朱汉城老师面前，而朱老师对我很客气，略加考察就把我招进来了。他问我想学什么乐器，我说小号。他认为我的嘴唇厚，吹小号太累，但也提及许多美国黑人小号演奏家嘴唇也厚。于是我改学萨克斯——因为周边几个同学都想学萨克斯，大家相对熟悉这个时髦的乐器，而我也不太知道其他乐器。其实我并不是太喜欢“油腔滑调”的萨克斯，还是更喜欢明快、激越的小号，时至今日依然如此。不过萨克斯的确更容易吹响，小号太难吹了——听老师的话没错。

入队以后成为新学员，就开始跟随老师上一对一的小课。我的指导老师是穆礼弟老师。穆老师真人不露相，他曾是解放军军乐团首席单簧管，迎接过尼克松，送别过毛周朱，指导我实在是大材小用。这也是我特别感谢军乐队的地方：我可以说，清华是我凭本事考进来的，但是能跟随穆老师学习则完全仰仗军乐队。每周一次课，印象比较深的练习曲有早先的贝多芬《小步舞曲》，还有最后的《牧羊姑娘》。记得当时曾萌生这样的念头：学吹号要比读博士重要多了，我愿意这样一直吹下去。

当时萨克斯没有系统的教材，图书馆也没有，发到手里的是一本音乐室 1983 年 10 月编写的 30 页油印曲谱《沙克管教程(初级)》(我没写错，就是“沙克管”)，没有文字说明，连指法都没有讲。后来我在海淀图书城发现了萨克管演奏大师波尔·博柔迪和他的导师编写的教程《萨克管演奏艺术》和《萨克管演奏曲集》，极为兴奋，买到之后边骑车边不时检查包里的书，生怕放置不慎折了书页，结果与自行车道逆行的一

位骑车者相撞。人没事儿，但是车子被撞得有点歪了，幸亏不是撞了汽车，否则今天怕是没机会写回忆了。我刚刚重新翻开这本书，扉页写着：“1992.8.5，海淀图书城，遭车祸，谨记！”



新学员半年亦或一年后有一次考试。考场简直是一个说相声的现场，且比相声精彩多了，因为演员不用说话，观众就笑声一片了。特别是听学员吹小号，在其声嘶力竭之中特别揪心他一口气上不来背过气去。我演奏的曲子选自波尔·博柔迪的曲集，法国作曲家玛丽原创的《五十》，好像法语音译也叫《拉西昆泰》。我自己在宿舍楼练习过一段时间，考前一周天天练，生怕考不过。记得考完试周乃森先生在总结中表扬了我，好像是因为我多少注意到了强弱差异。还记得现场我也手忙脚乱，生怕不小心碰坏了膜片，所以一直拿嘴叼着吹嘴儿，手里去倒腾谱架、曲谱什么的，下面也是一片笑声。

从学员队升入二队，就开始参加合练了。我记忆比较深的一次是寒假去京郊虎峪 200 号基地集训。首次跟随朱老师排练，很兴奋。朱老师符合我对音乐家所有的想象。校园里看到的朱老师常常身穿长呢大衣，头戴一顶贝雷帽，一下子就与理工科的教授区别开了。1988 级队友李强对朱老师的回忆我觉得特别准确：“他给了我一个很灿烂的微笑，让我寒冬腊月的心里感觉到了一种春天般的温暖。”记得排练《玫瑰狂欢节序曲》，这是一首优美而难度不太大的曲子，有个晚上在舞台上听我们木管声部合奏，那真是太美了，音乐的确带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还记得另一个晚上排练《自新大陆》，最著名的那段旋律恰好是萨克斯主奏，我正吹得起劲，突然听到朱老师说了句什么，我赶紧停下，乐队也跟着停了下来。朱老师问：“吹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停下来了？”我一打探，原来刚才朱老师是在表扬我——唉，我怎么那么不自信呢！

最高潮的记忆就是参加 1993 年 7 月下旬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吹奏乐比赛。机缘巧合，我和部分二队队员被选中与一队队员一起参加集训和比赛。那一次排练了三个曲子，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《玫瑰狂欢节序曲》《轻骑兵序曲》。其中《轻骑兵序曲》最难，我记得萨克斯参与演奏了方块 2 一段快板(Allegro)，

应该是全曲节奏最快的一段旋律，单簧管负责主旋律，萨克斯负责打拍子，每次排练都要重点练习，现在想起来都紧张。天津比赛如愿获得了冠军，这应该是军乐队第一个全国性比赛的荣誉，以前获奖多是在北京地区。朱老师获得了最佳指挥奖，那年好像正好四十岁。当时听朱老师讲，说有的专业指挥夸我们的《北京喜讯到边寨》演奏得像是专业团队所为。《轻骑兵序曲》也非常出彩，记得比赛第二天节目录像，本来每个团队只演奏一个曲子，但是特别请清华军乐队加演《轻骑兵序曲》。

除了团队比赛，还有个人比赛，陆松涛的小号获得了第二名。他选择的曲目是《音乐会练习曲》，可能是为了展示技巧，但是稍感曲高和寡；如果演奏他拿手的《西班牙斗牛士》，我猜测名次也不差，现场反响一定会很疯狂——台下坐满了正值妙龄的男女大学生。第一名是来自北方交大的长笛手，选择的曲目是《法兰多尔》，据说当年也是报考清华的特长生候选，但是因为谈恋爱没考上清华。队里长笛特长生生于源有些郁闷，他发现《法兰多尔》里面最难的一段没有吹，早知如此他也登台参赛了。

天津比赛时，我入队才两年，但是可能因为这一次经历太亮眼了，之后我的记忆就很淡了。印象中排练过《Heal the World》《阿尔维莫序曲》；保存的1994年5月13日军乐队的《学年音乐会》节目单，在演员名单里还有我的名字；记得在蒙民伟楼也做过单练、合排，看《军乐队大事记》那应该是1995年。我应该是1995年随1990级队员退队，简短的仪式是在蒙民伟楼排练室，我还发表了感想，主题就是今天这篇回忆的主题：在军乐队的日子是我在清华的幸福时光。

关于幸福时光，我想讲一个故事。1993年夏天的天津比赛结束后，我隔壁宿舍一位环境系博士生非要“逼”着我去学游泳。我和他都是清华本科毕业、1991年开始读博士，所以他在楼里听过我两年的萨克斯练习，使他倍觉自己在清华的日子实在过得单调，决心要做点改变，于是1993年夏季他就去学了游泳，考取了深水证。他学会游泳之后，简直欣喜若狂，他非要把他的喜悦传递给我，于是千方百计地劝说我也去学游泳。我好像是被逼无奈，就去报名学游泳，记得那是1993年9月初，当年最后一期深水训练班。应当说，我对学游泳还是有点怵头的，当时在学员中我算是年纪大的老人了（时年不到25岁），十天的训练班，别人早就学会换气了，我是第七天才学会换气，属于比较晚的一个。之后我考取了深水证，一直游到毕业，游到现在。毕业至今二十多年，我回忆在清华的幸福时光只想起两件事，第一是军乐队，第二是游泳，而游泳也是缘起军乐队。

我在清华十一年，从18岁到29岁，正值青春年华，为什么对幸福时光的回忆只限于这两件事呢？我在校期间也获得过校级奖学金，多门考试也得过100分，博士论文后来做得也不错，但是我总是很难把这些与幸福感联系起来。当然，竞赛胜过对手，论文取得突破，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幸福感，但是这和参加军乐队的幸福感很不一样。我比较肯定的一点是，清华学生缺乏幸福感，并非个别现象。听乐队同学讲，系里有的同学各门功课都很好，但是没有一门课喜欢，反倒很羡慕军乐队队员有个爱好。环境系我那位邻居同学也如此，他学习很不错，但就是觉得过得不快乐。名校学生缺乏幸福感具有一定普遍性，中外皆然，据说麻省理工、哈佛大学的学生幸福感指数就很低，我想清华大学的学生幸福感指数也不会高。我觉得清华的老师们幸福感指数也不会高，不过音乐室的老师除外。

我在军乐队为什么感到幸福呢？我一时也说不太好。小时候很喜欢、最终心想事成是个原因，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功利心、胜负感了。自己既非科班，又非特招，参加乐队既无心胜过别人，也不是太在意丢脸——不必事事争先，这对一个长期处于竞争赛道上的人来讲，是一种极大的解脱。赛道上的选手，

无论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，始终都压力巨大，而且科研这条赛道没有终点，意味着你必须不停地奔跑，无法停歇。我记得在 200 号集训的合练现场，心中曾经感慨过：滥竽充数的感觉真好:-)。听队友常宝成讲，队里曾经有个声部首席把 Solo 吹砸了，第二天都不敢坐首席、直接坐到后排了——首席之位看似风光，其实并不好坐。如果音乐成为我的职业，天天想着突破、创新，大概就与我的科研生活没什么区别了。

军乐队带给我的幸福感，还表现在我结识了那么多不同系、不同年级、不同特色的同学；如果没有军乐队，即使在清华再呆十年也不可能认识这么多人。男生中我想起常宝成，他是热能系 1987 级学生，1992 年读博士，宿舍仅隔一个楼。宝成大学就加入军乐队，吹长号，读博士之后继续吹，是军乐队的资深队员，和我一起参加了天津比赛。如果不是因为军乐队，即使他和我住一个楼也不会有多少交往。我常听宝成讲军乐队的轶事，也交流对音乐、科研的看法。记得有一次谈起小夜曲，我说我觉得小夜曲中海顿的最好听，怯怯地征求宝成的意见，宝成说他也同感，我因得到他这位资深者的共鸣而颇为高兴。还有一次谈起好像是《读者》有篇讨论水变油的文章，我说我懒得看了、请告诉我是什么逻辑，宝成说，文章的意思是，牛顿定律就那么铁板一块吗？我学会游泳之后，常和宝成约着一起去，特别是 1993 刚学会游泳那一年，我记得和宝成一起游秋泳，一直游到北京深秋的 10 月 28 日，整个游泳池每一次也就三五个人。

女生中我想起 1990 级电子系的虞慧臻、马晓雪、沙列维，她们也都参加了天津比赛。虞慧臻吹长笛，后来她和我都选修了实分析，这是一门比较难的数学课，我是因为读博士才选修，她则是真热爱数学，我博士论文有个数学定理还采用了她给出的一个更简洁的证明；后来她去北京大学读硕士、麻省理工读博士，一路走下去，成为一个纯粹的应用数学家。马晓雪吹单簧管，她好像也选修了实分析，特别是她的乒乓球、羽毛球打得都很不错，队员们很爱和她一起玩；可惜我和她好像只说过半句话——不是话不投机，而是没有机会:-)。沙列维敲鼓，她从名字到相貌到衣装都像维吾尔族姑娘，其实她是汉族，名字则是她父亲取自伊朗国王巴列维之名；天津比赛后集体去天津海滨浴场，据说她游得很远，我后来学会游泳后才理解，在游泳池游泳与在海滨中游泳大不一样——海里有浪。

军乐队不仅在军乐队员心里播种了幸福，还进一步通过队员们把这种幸福传播出去。看军乐队百年纪念文集，可知 1962 级的老队友徐锡安在北方交大做领导时拉起了军乐团，2010 级小队友宋嘉勋在云南支教时组织起 35 人的鼓号队，2010 级小队友冯洛苏在队里带了 11 个小徒弟。而我因为参加了军乐队，导致我隔壁同学和我先后学会了游泳，而我当了老师之后，一时没有条件推广军乐，于是我要求我的学生毕业前必须学会游泳。学校教育的影响在校园之外、毕业之后延伸，甚至代代相传。

对于军乐队的发展，也有一点建议。小的方面讲，建议进一步丰富曲目，选用一些旋律优美的新曲目。有人说西方音乐以和声见长，东方音乐以旋律见长，拉美音乐以节奏见长。考虑到我们的音乐基础，我觉得旋律还是最令人印象深刻，太高深的音乐适于参加比赛，但不容易引发普通观众的共鸣和记忆。1947 级老队友何曾佑、王尚真在其回忆中也提到选曲的问题。2013 年军乐队以《华丽舞曲》获得大奖，我在网上听了两遍，其难度的确比 1993 年获奖的《轻骑兵序曲》高得多，但是个人感觉其旋律远不及后者。我听过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《向德里纳河进军》，旋律非常优美，其中前一个是交响诗，各种管乐轮番独奏，只是部分弦乐不知如何替代，而后一个本就是进行曲，很适合军乐队演奏。1953 级老队友苟荣隆在其回忆中力荐《体育进行曲》，也可以尝试。周先生在队时，选用过一些俄罗斯乐曲，感觉旋律也很不错。此外，1947 级老队友茅沅回忆说张肖虎先生极力提倡民族音乐，故而合唱团除西洋名曲外多演唱中国作曲家的作

品。我想张肖虎先生并非不知道西洋音乐的总体成就更高，但是音乐教育宜保持必要的多样性、民族性。2013年军乐队参赛时还演奏了规定曲目《康定情歌》，我想类似的中国作品应该还有很多，不必非等比赛才选用。

大的方面讲，首先是提高的问题，特长生和零基础生都需要再提高。对于特长生来讲，原本有很好的基础，普通的大队训练可能对他们提高很有限，如果只有责任、没有提高，那就很难保持他们的兴趣和持续的参与，也就很难保持大队的水平。除了组织小乐队等现有形式之外，可以鼓励、支持更多的特长生辅修比如中央音乐学院的相应学位，其实这在文艺社团历史上也是有先例的。对于零基础的普通队员来讲，也同样有一个提高的问题。2010级小队友孟潇潇在其“一个普通老队友的自白”中有段话我很有同感：“说来很是惭愧，即便四年下来，离开了校音器还是听不出自己的音准高低，气息还是不稳，音色还是不行，被单听时还是吓得各种肝儿颤、各种冒汗，对于古典音乐还是听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离开了军乐，我的生活似乎就和管乐分开了...”我毕业之后，也没有再拿起萨克斯，并非买不起乐器，而是因为演奏、欣赏水平的提高并非买一个高级萨克斯就可以解决，需要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。网络时代可以利用的音乐教育资源更加丰富，因此学员培训可以更加正规化、系统化。老队友苟荣隆建议选修视唱练耳课，也许有助于队员提升水平和保持兴趣。

1947级的老队友黄昭度回忆说，早先清华农学院教授韩德章先生是“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”，能听唱片写总谱，其听力及乐理水平，虽专业音乐工作者不过如此。1959级的老队友王其祥的回忆中提到张肖虎先生说过：“我们军乐队先后出过三代音乐家，第一代有黄自、赵元任、应尚能；我和陆以循属于第二代；第三代有茅沅、汪声裕等，可惜你们这一代没有出现过专门的音乐工作者。”我觉得，培养“专门的音乐工作者”也许可遇不可求，但是培养“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”还是可以探索的。1959级的老队友姜华山提到“清华最长的一门课”很有启发性，军乐教育可以成为最长的一门课，因为现在读硕士、读博士的同学越来越多，他们要在清华呆上7~10年，只要能坚持，无论从头学什么都可以学到很高的水平，从零基础成长为“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”也完全有可能，老队友苟荣隆就是很好的实例。以“高水平的业余爱好者”为核心，相信军乐队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

提高之外就是普及，让更多的清华人触摸音乐、实践音乐、创造音乐。不仅仅是体验管乐，还可以体验弦乐、键盘乐。更为经济的是体验合唱、舞蹈。关键的一点是把音乐课从选修课提升到必修课，要考级、要达标，逐步提升到与体育课并重的地位。这看似有客观条件限制，其实更多是主观认识不足。重视体育、特别是重视体育的普及，是清华的好传统，为此还有相应的口号，但是对于音乐教育、艺术教育的重视则远不如体育。记得有一次一位校领导视察军乐队，说“你们是清华的门面”，我听心里感觉复杂。重视“面子”可以理解，把“面子”做好也不容易，人力、财力都得跟得上，看看军乐队百年纪念文集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。但是总体上讲，现在“面子”问题已经解决，我们有条件、有必要去尝试解决“里子”问题，即普遍提升清华人的音乐素养，进而普遍提升幸福感。

在军乐队迈入新百年之际，祝愿军乐人：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，为自己幸福生活一辈子！

写于 2020-8-11